

#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与城市化的进程和教训

谷延方<sup>1</sup>，黄秋迪<sup>2</sup>

- (1. 哈尔滨师范大学 社会与历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要】**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始于中世纪，先后经历11—13世纪的“快速发展期”，14与15世纪的“衰落停滞期”，16和17世纪的“恢复期”，18和19世纪的“加速发展期”，以及20世纪的“完成期”等不同的历史时期。英国城市化历史不仅留下一些经验，也出现过许多失误和教训，其中有些失误在今天第三世界城市化过程中还不断重演。反思这些失误和教训是正确认识英国城市化历史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英国；劳动力转移；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2-0099-05

英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早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相应进展。然而，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化的直接产物”的观点依然占有很大市场；同时以欧美、特别是英国城市化为范例，检验与衡量亚洲、拉美等国家城市化成败得失的观点也不在少数。实际上，英国城市化除了留下一些经验外，也出现过许多失误和教训。

—

大不列颠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据统计，1851年时，英国已有54%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可以认为是初步实现了城市化。人们普遍认为，是工业革命开启了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如此算来则大不列颠仅仅用了七八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堪称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二个“奇迹”，探求其成功的秘密已经成为中外学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时至今日，第三世界许多不发达国家还在步履蹒跚地经历着这一过程。

实际上，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并非开始于工业革命，而是更早，至少已历经800年之久。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历史进

程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开始。在11—13世纪英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时，就迎来了一个城市化的“小高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大大小小150多个城市，史称“城市复兴”。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也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浪潮。据统计，经历这一200年左右的城市化阶段后，整个欧洲城市化水平大约平均提高了10个百分点。中世纪史家布瓦松纳认为，大约有1/10左右的人口流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城市<sup>[1]</sup>(pp. 205-206)。在“城市复兴”的背景下，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据米勒与哈彻尔统计，到14世纪早期，英国城镇居民比例至少占到总人口的10%；利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帕利泽和达勒姆大学的布里特奈尔(Britnell)都认为，到1300年时，英格兰城镇居民占到总人口的15%<sup>[2]</sup>(pp. 274-275)。而理查德·霍尔特(Richard Holt)、克里斯托弗·戴尔(Christopher Dyer)等学者则认为，城市化水平已达到20%<sup>[3]</sup>(pp. 103-104)，后两者无疑秉持一种比较乐观的判断。

不过，中世纪英国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尚未扮演领头羊的角色，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尼德兰等国家，也低于欧洲大陆的法国。希尔顿教授等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YBSS0024)；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2YJC770016)；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C027)；黑龙江省高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1155G25)

人的研究成果表明,13世纪的英格兰就像现在的“殖民地”,出口大量原材料,而进口的则是奢侈品和制成品;城市数量远远低于法国,除伦敦、诺里奇等几个大城市人口达到万人之外,其他很多小城镇人口数量仅有数千人,其中约有一半城镇人口不足2000人<sup>[4](p.32)</sup>。中世纪英国城镇的乡村色彩浓重,伦敦大学的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甚至认为:“1286年的英国并不比1086年时更加城市化”,虽然城镇比以前更多、更大,但总人口也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有余<sup>[5](pp.250-253)</sup>。还有学者认为,直到工业革命前英国城市化水平仅在5%。显而易见,国内外学者们在该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并未取得共识。综合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对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不宜作过高判断,应该大致保持在15%左右或稍低一些<sup>①</sup>。相对说来,这是一个持中而审慎的判断,尽管也存在推测成分和误差,但与历史实际相去不会太远。

在中世纪晚期的14—15世纪,由于气候环境恶化、瘟疫频繁发生,欧洲大部分地区程度不等地经历了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经济衰退,大约损失了1/3的人口,英国也不例外。农业生产出现危机,耕地大量荒芜,许多市场小镇消失或退化为乡村,城市人口数量大为减少,甚至连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英格兰西南部科茨沃尔德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雅各布(E. F. Jacob)将其浓缩为一个词:“逆城市化”(de-urbanization),可谓是对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历史的高度概括<sup>[6](p.367)</sup>。据笔者估算,英国城市化水平下降到15%之下,大约在13%左右,甚至更低一些。

16—17世纪早期是英国人口和经济恢复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阶段。在圈地运动、宗教改革、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海外新兴市场等因素共同推动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在近代早期获得了长足进步,恢复乃至超过了中世纪盛期15%的水平,达到18%左右<sup>[7](p.242)</sup>。伦敦代表了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化最高水平。据研究,到1600年时,伦敦人口已经占到英国全部城市人口的60%,1670年上升为70%,1700年亦保持在70%左右,1750年时,依然超过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占55%<sup>[8](p.16)</sup>。一个城市巨人矗立在英国城市化历史舞台上。伦敦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以首都中心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对英国城镇经济和乡村农业生产,尤其是“乡村工业”的发展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史家费希尔(Fisher)称伦敦为英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sup>[9](p.37)</sup>。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英国城镇人口比例也不断提高,旧有的农业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据英国剑桥大学人口史专家里格利(E-

A. Wrigley)统计,到1700年时,英国城市人口约为总人口的17.0%,乡村非农人口约占28.0%,两者合计约占总人口的一半(45%);到18世纪中叶时,城市人口和乡村非农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为21%和33%,两者合计已占到总人口的54%<sup>[10](pp.162-170)</sup>。可见,总人口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主要在城市里,从事工商业或在乡村从事各种非农行业生产,摆脱了“依附于土地”和以农为本的生存状态。另据安妮·迪格比(Anne Digby)、查尔斯·范斯坦(Charles Feinstein)等人研究,在1700、1760年时,同期欧洲其他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劳动力平均水平比不列颠分别高10.8%和13.4%,而从事工业生产的男劳力则比不列颠低5.9%和6.9%<sup>[11](pp.70-71)</sup>。男性劳动力虽不是工农业生产部门的全部劳动力,但无疑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数字折射出英国已经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可见,近代早期的英国已经改变了以往那种落后地位,成为欧洲城市化的“领头羊”。

19世纪中叶,大不列颠在欧洲率先完成了城市化。20世纪以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城市化;而在二战后欧美城市化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郊区化时代。19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人口达到80.75%的最高峰之后,城市人口由市中心的商业密集区开始向城郊和郊区倒流,追求乡村田园诗般恬静悠然的生活环境,城市人口比例出现下降趋势<sup>[12]</sup>。人们初期视之为一种“倒退”——逆城市化,后来逐渐认识到这是对城市化人口高度集中状态下出现诸种社会问题,譬如,空气环境质量下降、工作压力大、交通拥挤及房价高昂等的一种反应,而居住在郊区显然不会有上述问题。因此,城市“市郊化”发展是对城市化弊端的一种扬弃,是对传统城市化模式的一种修正,也是城市化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的一种“成熟”表现。

## 二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目标的典型案例,人们常常对其城市化经验推崇有加,忽略了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反思其历史会发现,英国的失误和教训也同样典型,有些至今依然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存在着。揭示出英国城市化各种问题无疑可以克服时下普遍存在的“经验论”倾向,也有助

① 我国中世纪史专家马克垚先生也认为,戴尔等人“似乎估计过高”。见马克垚著《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也持大体相同观点。参见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于全面客观认识这一历史过程。

(一) 放任劳动力自由流动, 导致大城市畸形发展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有时难以同步, 严重失衡便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英国作为“原生型”国家有过典型教训。工业革命发生前后, 由于政府放任自流, 劳动力迁移的目标多为首都伦敦, 致使中世纪以来的人口流动集中态势进一步“极化”, 造成英国首都伦敦畸形发展, 其城市居民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60%—70%, 成为英国城市化舞台上的超级巨人, “像一具摇摇晃晃的躯体上所承载着一个超级大脑袋”,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 伦敦对英国是“有害的”<sup>[9](p.36)</sup>。由于城市经济并未同步发展, 无法提供大量的工作和就业岗位, 伦敦人满为患, 贫民窟成区连片, 令人触目惊心。譬如, 1841 年调查发现, 在古奇-普雷斯 (Goodge Place), 27 间房屋里挤住了 485 人, 平均每间房 18 人, 有限的空间里杂乱不堪, 塞满了手推车、各种工具和材料; 在西敏寺的教堂胡同 (Church Lane), 27 处住宅也容纳了 655 人, 在 1847 年则增加到 1 095 人。这些地方“青年男女混住, 单身汉同已婚夫妇混杂……满身虱子和寄生虫, 滋生了各种淫荡和不道德行为。”<sup>[13](pp.324-325)</sup> 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 涌入首都后沦为各色流民、无业者乃至乞丐, 数量巨大, 据统计至少占到外来人口的 1/3 以上。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也出现类似情形, 人口过度膨胀而工业化并未同步发展, 造成城市化畸形发展, 英国城市史专家乔纳森·巴里 (Jonathan Barry) 称之为“伪城市化” (pseudo-urbanization)<sup>[9](p.37)</sup>。

根据官方档案, 当时许多流民参与偷窃、抢劫、诈骗、散布异端邪说和煽动骚乱等, 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偷窃, 约占到流民犯罪的 1/2, 致使社会矛盾丛生。都铎王朝一系列的血腥立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譬如, 亨利八世时期颁布的 1531 年法令和 1536 年法令, 惩罚流民的措施有戴枷关押、鞭打示众、遣返原籍、割掉耳朵等; 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 1547 年法令也很严厉, 从罚作奴隶、在前胸烙“V”和“S”记号, 到处以死刑。简而言之, 以伦敦为代表的城镇当局采取了烙铁、皮鞭和绞刑架等暴力手段驱赶无业流民<sup>[14](p.143)</sup>。英国著名社会史专家阿萨·勃里格斯指出, 伦敦“这座城市有可能成为波及全国的犯罪、骚乱和疾病中心, 使人怀有恐惧感。”<sup>[15](p.152)</sup> 这是对英国城市化一种莫大的讽刺, 更是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

(二) 圈地运动造成乡村大量人口生计艰难

从 15 世纪末开始, 英国乡村上演了长达 3 个世纪之久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中, “大量农民脱离了土地”, 造成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

分离”过程。工业革命史专家保尔·芒图也说: “田里的人少了……大批破产的自耕农被逼往城市”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圈地运动对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据里格利等人研究, 当圈地运动将大量农村居民逐出土地、驱向城镇时, 1600 年英国城市化水平仅为 8.25%, 1670 年为 13.5%, 1700 年为 17%<sup>[10](p.162)</sup>。这一数字也仅仅是比中世纪盛期的 15% 稍高些而已, 没有出现加速发展的迹象。可见, 脱离了农村和农业生产的乡村居民并没有全部流向城镇, 至少大多数农民没有在城镇安家落户, 而是变成了“流民”。以伦敦为例, 据王觉非先生研究, 17 世纪中叶时, 伦敦除去 40 余万常驻居民之外, 每年还有数量高达几十万人的流动人口<sup>[16](p.16)</sup>。这些贫困人口季节性地向返乡之间, 因贫困而违法犯罪的现象非常普遍, 近代早期英国各类法庭受理的偷盗、抢劫等诉讼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圈地运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 圈地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 尤其是在近代早期。尽管现在学者们研究后认为, 圈地运动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地权革命, 但在部分地区确实夹杂着暴力行径, 至少也违背了广大普通乡村居民的意愿, 所以, 激起农民强烈不满。1536 年, 英国北部林肯郡和约克郡等地爆发了“求恩巡礼”骚乱 (Pilgrimage of Grace), 在仅仅 1 年间连续发生 5 次骚乱; 1547 年, 康沃尔郡爆发了农民起义; 1549 年, 该郡农民在凯特领导下再次起义; 1554 年, 怀亚特领导肯特郡民众起义<sup>[17](p.135)</sup>; 1607 年, 英格兰中部莱斯特郡、沃里克郡和北安普敦郡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18 世纪圈地期间, 各种反圈地活动也是连绵不绝, 如公开签名向议会请愿“反对圈地”, 或秘密地破坏“刚刚圈围的篱笆围栏”, 甚至同“治安法官率领的马队发生冲突”等等<sup>[18](pp.277-278)</sup>; 可见, 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村居民生活陷于贫困境地, 转变为乡村动荡不安的因素。所以, 许多英国学者不仅将近代早期视为经济扩张期, 同时也看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阶段<sup>[19](p.200)</sup>。

(三) 疏于环境污染治理, 严重危害城市居民健康

伦敦曾有“雾都”之称, 是英国城市严重污染的典型案例。据记载, 1952 年和 1962 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 最高污染浓度分别达到了 3 800 微克/立方米和 5 660 微克/立方米。早在 19 世纪, 随着工业化的进行, 炼油厂和化工厂产生的大量碳氧化物和硫化物释放到空气中, 城市居民呼吸的空气里充斥着严重的污染物质, 有时夹杂着酸雨和腥臭味; 大量污水污物也直接排进了泰晤士河, 臭气熏天, 河中特产鲑鱼

也近乎绝迹。1858年出现的“巨臭”甚至在下议院造成了恐慌,会议被迫推迟,时任议员迪斯雷利骂泰晤士河为“地狱池塘”<sup>[13](p.319)</sup>。工业化进程最迅速的约克郡西区污染更为严重,1867年,英国皇家委员会调研后认为,当地河流流淌着的与其说是河水,倒不如说是墨水。由于漫天烟雾,伦敦市民每年在冬季的12月和1月见到阳光的日子少得可怜。根据1837年建立的人口登记制度得出的人口死亡统计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格里高利·金关于“烟雾与疾病”联系的论断。数据表明,维多利亚时代大部分时期,1/4的死者死于肺病,由支气管炎导致的死亡率不断攀升;例如,1880年是30%,1891年是60%,在最糟糕的1892年,各种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达到90%<sup>[20](pp.49-58)</sup>。可见,空气污染对城市居民生命健康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害。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伦敦在工业化过程中受到的严重污染。

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政府抑或排污企业?1876年英国就颁布了《河流污染防治法》,但许多排污企业置若罔闻;1864年,伦敦建成了排污主干管道,但污水仍是不经处理便直接注入泰晤士河下游;1821年,英国颁布了《烟尘禁止法》,结果是工业烟尘照排不误。不仅许多企业家漠然视之,甚至连许多民众对环境污染也熟视无睹,直至20世纪中叶,“伦敦烟雾”事件才迎来雾霾治理的历史契机。

(四)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生命安全缺乏保障

截至17世纪末,伦敦等城市大部分房屋建筑材料为木质,极易引发火灾,许多城镇如东迪勒姆(East Dereham)在1581年,贝克尔斯(Beccles)在1586年,圣埃德蒙-伯里在1608年,怀门德姆(Wymondham)在1615年,绍斯沃尔德(Southwold)在1659年,纽马基特(Newmarket)在1682—1683年间,邦吉(Bungay)在1688年都发生过火灾<sup>[21](p.37)</sup>。当然,最典型的是1666年9月2日至5日的“伦敦大火”,造成城中1/2以上的建筑物被烧毁,其中包括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87座教区教堂、44座同业公会大楼,以及1.32万幢房屋,至少10万人无家可归<sup>[13](pp.108-109)</sup>。此外,许多城市卫生设施也极不完善,没有室内厕所和下水道,人畜粪便随处可见,饲养猪、牛和马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依然是英国城市里非常普遍的现象。据记载,1874年,普利茅斯市卫生官员在考察时发现了一堆前所未见的污物粪堆散发着臭气,“重约3000吨”;而伦敦在1900年以前,每年要从城市街道和马厩中清除100万吨的马粪。污秽的环境非常利于细菌病毒传播,任何地方病和疾病都会造成很高的死亡率,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中

间。英国革命史专家希尔提供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18世纪初,伦敦的一个教区每出生4名婴儿几乎就有3名死亡<sup>[22](p.307)</sup>。像鼠疫、霍乱、热病、伤寒等各种流行病在16—17世纪多次发生,尤其是鼠疫在黑死病过后的3个世纪里依然定期光顾伦敦,在1563年造成了首都1/5人口死亡,在1578年和1582年死亡人数分别是6000人和7000人,1593年和1603年分别为1.8万人和3万人,1625年则为4万人,而1665年的“大瘟疫”竟然夺取去了8万人的生命,造成伦敦全城几近1/5的居民消失<sup>[23](p.64)</sup>。

当然,英国其他城市的死亡率也非常高,但伦敦无疑是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舍菲尔德大学社会史教授迈克尔·布拉迪克称其为“死亡陷阱”(death trap)当不为过<sup>[24](p.114)</sup>,这与首都繁荣的经济形成鲜明反差。各种疫病在近代早期成为一种“都市现象”,使得城市变成了一部“杀人机器”,这显然与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恶劣易于传播病菌密切相关。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认识,英国政府更多是采取暴力手段“隔离”“鞭打”,甚至“绞死”身患瘟疫的患者,或者将其随身携带物品烧毁,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18世纪。例如,1720年,英国还将两艘来自塞浦路斯岛的可疑船只烧毁,仅赔偿其主人2.4万英镑。因此,时人说:瘟疫“使我们彼此之间比狗都残忍”<sup>[25](p.83)</sup>。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伦敦等一些大城市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7—18世纪一直徘徊在35—38岁之间,比乡村地区低很多。

(五)城市食品供应不稳定,各种违法行为普遍

城市居民时常受到食品短缺的影响,饥荒频繁发生。第一次灾难性的歉收发生在1482—1483年,进入16世纪后,灾荒更是接连不断,其中20年代出现2次大面积减产,这种灾荒在50年代、80年代相继出现,90年代则庄稼连续四年歉收。农业歉收对城市最直接的影响是食品短缺,造成许多城市居民营养不良、粮价高涨和死亡率上升,譬如,伍斯特市在1556—1557年的灾荒中,近1/5居民如无救济就无法活命。17世纪时,英国发生两次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第一次是在1623年,因1621年和1622年连续灾难性歉收所致;第二次发生在1695—1659年间,饥荒在不列颠东北部最为严重,大约造成阿伯丁20%人口死于饥谨,整个苏格兰死亡率则高达13%<sup>[21](p.206)</sup>。

城市居民因食品短缺而引发的造假、囤积等不法行为非常普遍。16世纪都铎王朝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频繁颁布“打击囤积居奇者、倒买倒卖者”的各种法令证明了这一点。此类违法行为显然屡禁不止。直至17世纪,各地市民

的书信里还经常抱怨各种“谷物囤积”行为,以及不法分子教唆穷人“密谋造反和叛乱”,伦敦、布里斯托尔和约克等城市商人向国王枢密会递交的请愿书中涉及内容也尽是“谷物、鲱鱼”等食品的不法销售问题<sup>[26]</sup>(pp. 254-256)。而1765年的歉收不仅造成伦敦谷物市场小麦价格飙升,而且在牛津、伯明翰、莱斯特、巴斯等地“发生骚动,磨坊、店铺和市场遭到抢劫”。在这样的背景下,城镇居民生活饮食难以保障,有的仅靠“面包和发霉的马铃薯”糊口度日,境况最糟糕的当属纺织工厂里的学徒童工,他们“食品变质而不足,黑面包、燕麦粥以及变味的猪油”。在利顿密尔,“学徒们常常为了同工厂院子里所养的肥猪争抢猪槽内的食物而进行搏斗”<sup>[27]</sup>(pp. 337-346)。由此,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患病几率大大增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加洛韦(P. R. Galloway)研究了1670—1830年间的伦敦市民后发现,首都居民因天花、伤寒和热病等发生的死亡与粮荒和高物价之间存在密切关联<sup>[28]</sup>。

当然,城市食品供应不足并非完全由农业歉收导致,英国农业产量一直在稳步增长,但人口在工业革命后大幅增长,如1751年人口约为725万,1831年则高达1630万人,也是谷物供不应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英国在关税保护政策下一直实行“谷物法”,限制谷物进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粮食短缺的恶果。实际上,正是因为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严重社会问题,才引发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许多人仿效卢梭,批判城市生活,留恋过去的田园风光;更有一些社会进步人士,如圣西门、欧文、马克思等人产生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和革命的想法。

综上所述,英国在历时近千年的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过程中留给后来人的,不仅有成功的经验,更是有许多失误和教训。

### 参考文献

- [1][法]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五至十五世纪[M]. 潘源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2]Edward Miller, John Hatcher, *Medieval England: 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M]. London: Longman, 1995.
- [3]D. M. Palliser,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R. H. Hilton, *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英]约翰·吉林厄姆, 拉尔夫·A·格里菲思. 中世纪英国:

- 征服与同化[M]. 沈弘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6]E. F. Jacob,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7]谷廷方.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 [8]David Nicholas, *Urban Europe, 1100-1700*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9]Jonathan Barry, *The Tudor and Stuart Town, A 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530-1688* [M]. London: Longman, 1990.
- [10]E. A. Wrigley, *People, Cities and Weal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 Blackwell Press, 1992.
- [11]Anne Digby and Charles Feinstein, *New Direc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M].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
- [12]王章辉. 英国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J]. 世界历史, 1996, (6)
- [13]Roy Porter, *London: A Social History* [M]. Penguin Group, 2000.
- [14]尹虹. 16、17世纪前期英国流民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5][英]阿萨·勃里格斯. 英国社会史[M]. 陈叔平, 刘成,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16]王觉非主编. 近代英国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7]Stephen J. Lee, *The Mid Tudors, 1547-1558* [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 [18]J. M. Neeson,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700-1820*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9]Keith Wrightson,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1470-1750* [M]. Penguin Group 2002.
- [20][英]布雷恩·威廉·克拉普. 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M]. 王黎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
- [21]Peter Clark,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 1540-1840*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2]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 [23]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 *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4]Michael Braddick, *God's Fury, England's Fire: A New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s* [M]. Penguin Group, 2009.
- [25]Paul Slack, *Plagu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6]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ngland from 1000 to 1760* [M].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77.
- [27][法]保尔·芒图.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28]P. R. Galloway, 'Annual Variations in Deaths by Age, Deaths by Cause, Prices, and Weather in London 1670 to 1830'. *Population Studies* [J]. 39 (1985), Issue 3, P487.

(谷廷方: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 黄秋迪: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晓校]